

换拉链的地方很难找,菜场菜摊越来越少,停车成了大麻烦,城市生活便利度引关注——

人民日报:大城市别忽视“小”事情

人民日报17日刊发“关注生活便利度”系列报道之“居家”篇,聚焦城市中的种种“不便利”。

样本1

换拉链跑半个城

“换条拉链跑了半个城。”住在北京金融街附近的康大妈抱怨。她去年从郊区搬到城中心儿子家住,发现繁华都市的生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便利。“没有杂货店,只有大商场、大超市。买吃买喝倒是挺方便,还有那些名牌店,看着挺过瘾,可想换条拉链、修个鞋、织补个毛衣什么的,真不知该去什么地方。”最近为了给穿惯的一条长裤换拉链,她打了好几个人、兜兜转转好几圈才找到愿意也能给她换拉链的地方。

5月9日,广州市民洪女士发现,一些专业修鞋铺开始出现广州的地铁站,他们甚至以连锁品牌的形象出现,“还能找到补鞋的地方,看来还是考虑到市民生活的便利性。”但是,这些改头换面、眉清目秀的修鞋铺,价格高了几倍。

在这方面,上海老百姓相对比较方便。

样本2

买菜只能去超市

“小区门口的几个菜摊水果摊,最早是挪地方,然后缩小规模,再后来彻底消失了。”北京市民凌云对此深感不便。凌云是自由职业者,住在五棵松附近的一个小区,每到下午都要买菜做饭。菜摊没有了,她要走远些到超市买菜。“超市的菜,一来贵,二来不新鲜,真的不如传统的菜市场或小菜摊好。”凌云在北京居住了15年。“有时候挺怀念那时候的北京。”她说,从前住处附近热闹的菜市场里,总有最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有现烤的芝麻烧饼、转炉瓜子。“眼瞅着一个一个被抄了。现在北京特有国际都市气质,但作为一个小小的市民,也需要这些小摊。”

追求整洁的市容市貌,该如何兼容市民的基本需求?上海市近几年一直在对菜市场菜摊进行整顿,不过,上海在按照社区设置的菜场之外,还把那些不起眼的弄堂、小马路利用起来。在中心城区的宁康路附近,既有正规菜场遵义路菜场、三角地菜场、明珠菜场,又有周家桥街道、华阳路街道区域沿着苏州河的小路边的好几个马路菜场。

样本3

客人来了愁停车

“在广州没车不方便,有车也不方便。开车不方便,不开车也不方便。”谈起生活便利这个话题,家住广州市中山大道的王敏表示,最心烦停车。单位附近停车费10元一小时,上班一天,停车费近百元。这钱要花出去也不容易。早上7点开始,附近的停车场就开始拥挤不堪,停车位十分难找。广州车位比大约是1:0.4,每天都有数十万辆车找不到停车位。

广州市政府提出每年新增5万个停车位的硬性目标,与车辆的增加速度相比,显然杯水车薪。目前全市登记的正规停车位仅60多万个,即使加上郊野空地、乡村路边等可停车的地方,预计全市缺口也达到50%以上。

自家停车难,去朋友家探访照样担心没地方停车。“周末开车出门,路上还好,停车却是个大麻烦。”宋女士说。最近,北京市东城区倡导居民区和周边单位错时停车,并鼓励单位的停车场在非工作时间对外开放。但这种做法能在多大范围推广?多数受访的市民不抱有信心,“大单位太多,人都进不去,能让车进?”

样本4

“睡城”不便利

京沪穗三地的许多市民表示,老城区出现了新的便利问题,但真正不便的还是新城区。

唐旻夫妇2005年买房选择了嘉定安亭新镇。入住之后,小夫妻发现,风景看起来很美,但待解决的事儿一桩桩很具体:商业配套进展缓慢,偌大一个镇,只有两家便利店。几年后,住户增加,这里才开出一家联华小超市,零星也兼卖点菜蔬,一家水果店同时卖点冷冻肉类。新镇迄今没有药店,也没有医院。基本的设施都没有,更不用说修鞋、缝补、理发等服务了。安亭新镇、松江新城、罗店新镇等上海“一城九镇”的郊区新城,多是“睡城”,生活便利度低。

居住在北京东五环豆各庄的屈先生说,“其实老百姓买房时对生活便利问题有心理准备,但基本的需要还是应当有保证。”屈先生认为,政府有必要通过制定政策,对新建小区在建设时就提出基本的要求,比如必须引进可以提供综合性服务的便利店,必须有一些基本的服务设施等,可以考虑提供一些补贴。

民生·民声

便利背后有科学

提高城市生活便利度,固然需要增加生活设施,也需要对生活设施合理规划布局、精细运行管理。城市规划是一门新学科,需要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融入其中,统计学、传播学、人体工学等新兴交叉学科的运用必不可少。建中央商务区,不应是地方领导“赶时髦”,而应是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进行细致分析后的科学决策;新地铁的路线,也不应是决策机构召集相关单位开个会就决定,而应是对人流、客流进行充分调研统计,并经过反复论证甚至听证后的科学规划。不仅大的城市功能区规划、交通路线规划需要科学支撑,社区垃圾站、公共厕所等小型公共设施的布局,也需要引入科学手段,对使用率、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只有这样,城市的快速发展才不会让人感到“大城市还不如小城市”,政府大量的财力物力投入才不会让市民发牢骚说是“花架子”、“糟蹋钱”,才不会“好心办坏事”。

据人民日报(作者 鲍丹)

新闻链接

生活便宜度权重0.30

2007年5月,中国《宜居城市科学评价标准》发布。生活便宜度权重达0.30(30分/100分)。生活方便、适宜是宜居城市最重要、最核心的影响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综合

今日视点

成为“富豪摇篮”的大学没什么好自豪的

国内哪所大学造就的亿万富豪校友最多?谁又是培养杰出校友最多的高校?答案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记者从中国校友会网5月16日发布的《2012中国大学杰出校友排行榜》获悉,改革开放30多年来,清华大学培养和造就84名亿万富豪校友,校友财富合计近3000亿元,超越北大成为2012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冠军。北京大学有82人,名列第二。

(5月17日《广州日报》)

清华、北大两校造就的亿万富豪校友遥遥领先于其他大学,被外界称为中国“亿万富豪摇篮”并不为过。

清华、北大培养出大批富豪,确实也是办学成绩的一方

面,但“亿万富豪摇篮”绝不是大学的核心取向,如果出不了大师,即便出再多的亿万富豪,也没什么好自豪的。

正如有识之士所言,中国大学不缺富豪缺大师。清华、北大的办学成果为何是出富豪而不是出大师?为何诺贝尔奖一直与清华、北大无缘?清华、北大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为何落在后面?

作为“中国最好大学”的清华、北大,如果不着眼于培养大师,不着眼于把大学精神发扬光大,而是躺在创富功劳簿上沾沾自喜,以“富豪摇篮”作为炫耀的资本,那么,这样的大学就太让人失望了。

现在,不仅哈佛、耶鲁、麻省、牛津、剑桥等世界名校把清

华、北大甩在身后,就是在中国,许多高考状元也放弃清华、北大,奔香港大学而去。坊间就有“港大将清华、北大扫为二流大学”的议论。

正如有网友所言,“像清华、北大这样的高校集中了很多人才,占用了许多资源,但学术氛围不够。”在这样的现状下,内地大学更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大学精神的关键应该在于追求真理、笃实学术,培养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弘扬大学精神,而不是津津乐道于培养了多少富豪。

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之谓,非大楼也,乃大师也”。但是,毋庸讳言,近年来,包括清华、北大在内的中国大学,房子越盖越豪华,但是

普遍有精神失落的倾向:大师难出、学术腐败、拜金主义,这些都制约了中国大学的发展与变革。很多大学,离金钱太近,离学术太远。清华大学热衷培养“论文博士”,教学楼命名真维斯楼,就是佐证。

成为榜单上的“亿万富豪摇篮”,对于清华、北大来说,并不值得炫耀,反而应该自省:为什么我们会被称为富豪摇篮?是不是我们在世人的眼里,跟金钱走得太近了?要想缩小与国际一流大学的差距,要想回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清华、北大首先就要从反省自身称为富豪摇篮开始。

(叶祝颐)

热点纵论

山寨奖盛行,才有痴迷的“证书帝”

广东肇庆一名五旬教师杜伟新17年间倾尽家财,购买“共和国之星”等各种证书200多个。家人称他现在穷得只剩下奖状了,并呼吁有关部门查处骗人评奖。岳父说,如今女婿穷得只剩下各种获奖证书了。对此,记者追问:谁能“拯救”杜伟新?杜伟新的家人则呼吁有关部门查处那些骗人钱财的评奖。

(5月17日《广州日报》)

200多个证书,动辄“国家级”甚至“世界级”,比如“共和国之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突出贡献人物”、首届世界民间文艺最高奖“和平鸽”金奖、“中国时代卓越人物”、“国际杰出专家”……这些滑稽的“获奖证书”背

后,却是货真价实的血汗钱——原来这些证书是杜伟新买的。

事实上,除了抽烟和吃饭,杜伟新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用在评奖上了。虽然他身边的人都知道,这些买来的“获奖证书”就是废纸一张,但杜伟新却在“独醉”,视其为自己的“命根子”,陶醉其中。

花10万多元钱买200多本所谓的“获奖证书”,这对于一个原本不富裕的教师而言,是个悲剧。也有人认为,杜伟新的悲剧是极端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如果我们愿意看得深一点,自然而然就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如果那些骗人的山寨奖不盛行,怎么会有如此痴迷的“证书帝”?

比200多张证书更悲情的是,杜伟新的“证书人生”竟然走过了漫长的17年。因为痴迷评奖,17年间,他省吃俭用,倾尽所有的同时,也荒废了事业,自己也变得偏执古怪,成为社会“另类”。杜伟新的17年“证书人生”,也让我们见证和领略了山寨“获奖证书”生命力的顽强。

据报道,2006年至2009年期间,由中央纪委牵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参与,全国共清查各种评比达标表彰项目148405个,保留了4218个项目,总撤销率为97.16%。面对这些堪称天文数字的“山寨”奖项,杜伟新不是“独醉”者,还有数不清的“痴奖”者与他同行。比如,去年

闹得沸沸扬扬的倪萍荣获“共和国脊梁奖”就是明证。

17年花10万多元买200多个山寨版“获奖证书”,我们不能将其简单归结为个体的悲剧,荣誉、职位可以买卖泛滥,社会荣誉观、价值观的扭曲,才是滋生“杜伟新们”悲剧的社会土壤。

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些人与杜伟新相比,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比如,有人买“官帽”,有人买××协会理事、会长的称号,甚至还有父母给上学的孩子买班干部……凡此种种,在性质上与杜伟新殊途同归,不是同样招天下人耻笑吗?可见杜伟新的悲剧,也是我们的悲剧、社会的悲剧! (惠铭生)

公民发言

演唱会停了 反思不能停

针对网友质疑云南省富源县作为国家级贫困县却砸千万元办演唱会一事,富源县委县政府16日叫停了该场演唱会。富源县说,网民们提出的“目前早情仍在持续,不适合举办大型节会活动”的建议十分合理。

(5月17日《人民日报》)

媒体一曝光,富源县立马“高度重视”,迅速叫停,这个很好。但人们还有一疑:这样的“过”,真的是“闹”了才知其是“过”吗?判断“贫困县花巨资搞演唱会”的孰是孰非,仅靠常识即可。更何况,一直以来,类似于富源县这种迷失方向的“演唱会”,屡因曝光而叫停。为什么老百姓马上可以分清对错的事情,富源县委县政府却会犯案?“闹过即改”自然比置若罔闻要好,但人们更要追问:是相关部门真的幡然彻悟,还是危机公关的金蝉脱壳?

“演唱会”停了,反思不能停。这些劳民伤财的各种节,效果如何,一些地方政府一清二楚。之所以明知办节是花拳绣腿,仍然乐此不疲,原因就在于一些官员的浮躁心态和投机心理。有官员坦言,办节是为了弄出点“动静”,只有有了“动静”,让上级注意到,以后有晋升机会才能轮到自己。从一些地方官员的视角看,要弄出“动静”,办节造庆是捷径。因为举办节庆活动大张旗鼓,领导电视上有影,报纸上留名。而且可借机与前来剪彩、祝贺、讲话的上级领导拉近关系。

没规矩无方圆,办节亦然如此。节可以办,但要规范,是否举办、如何举办,不应是政府一方说了算。举办之前要召开听证会,咨询、征求专家和老百姓的意见,然后要提交地方人大进行审议。

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各界监督的方式,把一些官员追求表面政绩的办节冲动,牢牢地拴起来。否则,尽管现在“穷摆谱”演唱会停止了,谁能断言下次不会再冒出来?

(奚旭初)